

夏坚勇:给历史照了一个CT



夏坚勇 受访者供图

“景德四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得要晚些。”

“刘娥出场了。”

“寇准踌躇满志地上路了”。

宛如一位老练的赛事解说员，夏坚勇言语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。在极具张力的讲述中，历史的大戏徐徐上演。

新近出版的《东京梦寻录》一书，与之前出版的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，合为夏坚勇“宋史三部曲”——以史叙事的三部长篇历史散文。在夏坚勇构建的历史大舞台上，时空背景从宋代的汴京与临安延展开去，人物、事件和那些喜怒哀乐，则有着中国人所共知的大致轮廓。夏坚勇赋予这一切以纤毫可见的细节，耐得住远观，经得起细品。

夏坚勇的文字恣意放纵，但在公众场合，他倾向于保持缄默。蛰居江南，他像个隐士那样坐在清风朗月之间，思绪天马行空地驰骋于史料，又时不时停下来打量那些隐秘的角落。

评论家王彬彬评价夏坚勇的创作：“历史学家是给历史照一个X光片，夏坚勇是照了一个CT。”

宫廷、权谋、政治，皇帝、士人、百姓，于文学的幽微之间洞见历史的春秋大义，夏坚勇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的疆界有所拓展，一头侵入小说，另一头侵入学术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



“宋史三部曲”(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《东京梦寻录》)
夏坚勇 著 译林出版社



夏坚勇

散文家、剧作家。现居江阴。代表作有《湮没的辉煌》、《大运河传》、“宋史三部曲”、《绍兴十二年》、《庆历四年秋》、《东京梦寻录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学奖、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奖项。其散文创作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见长，是国内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。

并不是因为一个时代好，才去写它

读品：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？

夏坚勇：我曾经说过，谋生、虚荣和表达的自由，是我选择文学的全部理由，但在不同的年龄段，这三者所占的份额是不同的。毋庸讳言，我最初从事文学的目的并不高尚，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，又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艰苦的农业劳动、微薄的收入、一贫如洗的家庭，让自己很难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逃脱繁重的农业劳动，逃脱炼狱般的乡村，无疑是自己的最高目标。人首先得生存，然后才能说得上理想信念之类。我当时别无长物，只有一样：省立高中毕业，从小又喜欢阅读，文字功底尚可，起初从宣传队演唱材料和通讯报道写起，从遵领导之命到自觉有所追求，稍有成就后又渐生虚荣心（虚荣心是一个作家最原始的驱动力之一）。1973年11月上旬，我的一篇小说《车辙》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朝花副刊，占了一个整版。那是我文学创作的处女作。从那时候算起，今年应该是我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。

读品：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了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？

夏坚勇：我起初是写中短篇小说和话剧的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转向文化散文或者叫历史散文的写作，这种转变的原因，在于我追求一种更自由的表达，而散文，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文化散文——则提供了这种可能。我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表达有两层意思，一个是审美层面的，我从小的阅读偏重于历史，在知识储备、艺术趣味和情感方式等方面受到的熏陶较多，对那种尘封已久的典雅和华丽，以及融个人的命运感与历史宏阔于一体的悲壮惆怅的境界心向往之，因此，在操练这种文体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投入，也在自己有限的才情以及知识、文笔和历史解读等要素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题材的写作一般不具有敏感性，你可以私语也可以喧哗，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。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，我已进入中年，谋生和虚荣已不再重要，表达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有意义的追求。

读品：“宋史三部曲”创作的缘起是什么，写了多长时间？

夏坚勇：文学创作，写什么，不写什么，有时带有相当的偶然性，写宋史，并不是我蓄谋已久，也不是我对宋代特别有感情。作家的写作动因，是因为对某一件具体的历史事情产生了兴趣，进而产生了探究的欲望，再进而触发了灵感和创作冲动。具体到“宋史三部曲”，《绍兴十二年》最初的创作动机是要探究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，最后弄明白了，是因为宋金和议后，南宋王朝要政治转型，由战时体制向和平发展转变，与什么和战之争、忠奸之辨、善恶之分并无多大关系。《庆历四年秋》的创作缘起，也是出于好奇，即一桩小小的公款吃喝案，为什么会被处分得那么重，因为皇帝是以“恭俭仁恕”著称的宋仁宗，这个以“恭俭仁恕”著称的仁宗为什么要对一桩小小的公款吃喝案痛下狠手。《东京梦寻录》中的天书事件，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，一目了然，但宋

真宗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场历时十数年且波及全国的造神运动。把这些搞清楚了，一部作品的构想也就出来了。我是懒散的人，三本书写写停停，一共用了十年时间。我不是一个高产作家，但我是认真的，在写作中有足够的耐心。

读品：陈寅恪先生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，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”，你认可这个评价吗？你如何评价宋朝？

夏坚勇：很多人都问我类似的问题，我对宋朝当然有自己的认识，但是写“宋史三部曲”与宋代的文化是否登峰造极并无关系。并不是因为一个时代好，才去写它，如果这样，该如何理解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的写作，作家写一个题材，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共情的东西，作家对历史的陈述，其实是他的个人心灵对历史和人性的观照与辐射，如此而已。

看资料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识货

读品：在“宋史三部曲”的写作过程中，遇到了哪些困难，怎么解决的？

夏坚勇：一部长篇作品，从头到尾，文不加点，恣肆汪洋，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。写得不顺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我的对策，一是看史料，仔细寻找其中的缝隙以及属于那个时代的色调和气息。有时候，史料中一点点富于意味的新发现会让你豁然开朗。还有就是看题材或风格相近的经典作品，从经典中得到启发。再有一个就是把已写完的部分反复看，激活自己的灵感。这就有如挖水沟时挖不下去了，就把已挖成的一段水鼓荡起来，向前冲刷，反复鼓荡，反复冲刷，慢慢地就会冲刷出新的水道来。

读品：您的“宋史三部曲”加起来有70万字，需要庞大的材料支撑，从书中内容来看您用到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宋史》等史料和文献，从史料、文献到文学作品，你是怎样完成“重组”或者“再生”的？

夏坚勇：看资料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识货，而识货的前提则是你是不是具备了文学的想象力。你具备了想象力，就能像磁铁一样，把你有用的东西分拣出来。有没有这块磁铁，以及这块磁铁的磁性强弱，考验着你的想象力，它融汇了你的经历、学养、情感方式和审美取向。因为你在发现某个有价值的材料时，你的想象力同时已经给它在作品中安排好了位置，这是水到渠成的关系。我历来认为读书和读史料都是需要才华的，没有才华，要么就是对有价值的资料熟视无睹，要么就是掂量不出资料的分量，把高品位的资料浪费了。

我在《东京梦寻录》中用了一个士兵背粮的细节，原始资料出自宋太祖防止骄兵的举措，我马上想到可用于《梦寻录》开头一章，作为笼罩全书的一个重要细节，即宋王朝开国已近五十年了，当年太祖的一系列励精图治之举已流于形式，宫城前东西大道上士兵雇人背粮的情节，既是大雪中的一幕景观，又为全书一系列情节的铺展呈现了一个大的背景。

读品：除了丰富的史料和文献，有没有做过一些田野的考察？

夏坚勇：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，我不认为田野考察是绝对必要的，一千年的人事沧桑，你现在去能看到什么？看那些油漆未干的假古董，还是红男绿女们的

衣香鬓影？鲁迅当年曾想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长篇小说，到西安去采风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田野考察”），看了西安灰蒙蒙的天空，一点情绪也没有了，后来当然没有写。我很理解鲁迅的这种情绪。田野考察，并不是要寻找当年的什么遗物，而是要调动起心头的那股与历史相勾连的情绪，也就是所谓的发思古之幽情。如果不能调动那股情绪，还不如不去。在写作“宋史三部曲”之前，我已写了《湮没的辉煌》和《大运河传》，在那期间倒确实勘踏过不少地方，至少大运河（包括汴河）沿线的地方都去过了，杭州、开封、洛阳自不必说。还记得在杭州凤凰山麓的密林里，我努力想找到当年南宋宫城的片瓦块砖，但是没有。我只能坐在那里呆想，遥想当年这一幕幕历史场景。在开封也是，那个冬天的下午，我坐在开封的城墙上，四望无物，只能呆想。呆想是一个作家的权力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财富。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品格，从大的方面说取决于作者的史识和情怀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，一个是语言，一个是想象力，想象力太重要了。可以说，早在写作“宋史三部曲”十多年以前，我已经为这部作品中的氛围和色调有所谋划，采风并不一定要看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，而是要通过眼前某种事物的触发，和历史现场发生勾连，也和作家自己的情感基因发生勾连，这时候，文学的想象力就开始飞翔了。

写作中遇到难题，丢下笔就去走

读品：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？

夏坚勇：我老家有一句俗语：“半夜打纲上扬州，天亮了还睡在床上。”讽刺那些只会说空话的人，我不做那样的人。但想法可以透露一点，可能会换一种写法，挑战一下自己的力量感和创造力。

读品：平常居住在哪里？日程表如何安排？

夏坚勇：住一座江南小城里，有时也去上海住些时间，两个地方都是我喜欢的，因为一个靠江，一个靠湖，我的第一篇文化散文《寂寞的小石湾》就是从长江写起的，大江东去，让人心胸为之浩阔。当然大江也有感伤的时候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湖在上海，《东京梦寻录》最后押尾：“辛丑立秋于兰香湖畔。”该湖是人工湖，名字小气了点，但风景不错。我每天的日程，三餐后走路各一个小时，这是为了控制血糖。上午买菜，烧饭，下午看书或写作，晚上时有饭局，三朋四友，小酒斟酌，可愉悦心情。

读品：您有什么爱好？这些爱好对写作有影响吗？

夏坚勇：喜欢走路，视走路为享受，70岁以后，仍每天走2万步以上。走路一为健身；一为思考，写作中遇到难题，丢下笔就去走，往往能打开思路。

读品：最近在读什么？

夏坚勇：对比着看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，觉得写贵族生活，《红楼梦》已臻极致，《金瓶梅》中偶尔涉及上层冠盖玉堂金马，笔力便显得浮浅。但写底层的小人物，《红楼梦》则不及《金瓶梅》，你看西门庆死后的那些回目，写树倒猢狲散，笔下如鱼得水，何其精彩。这就不光是作家的才华，还有个人经历使然。也看点“闲书”，最近看的是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》中的几本，有趣。